

■珍品鉴赏

宋代金银窖藏：简约的美器

黄婷

光阴阑珊，陈迹宛然。四川博物院“高山仰止 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上，有五件来自彭州的宋代金银器，光华流转间凝聚着宋代器物的简约之美。

1993年11月，考古人员在彭州市西大街发现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宋代金银窖藏，共出土351件金银器，其中115件为国家一级文物，代表了当时金银器制造的最高水平，被称为“天下金银第一窖”。其中刻有铭文的器物有250余件，铭文近480款，大部分为“董”“董宅”“陇西郡董宅”（图1），可见器物为董氏家族所有，少量虽非董氏原有，但可能是通过送礼、陪嫁、抵债等渠道进入董氏家库。

窖藏是古人在动乱年代里隐藏、保护财产的方式之一。在南宋宝庆三年（1227）和祥兴二年（1279）之间的半个多世纪里，宋蒙战争不休，导致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窖藏。南宋端平三年（1236），蒙古军分三路伐宋，其中西路军从汉中攻入四川，成都府彭州城一户董氏家族提前将日常使用的金银器掩埋起来，希望战事平定之后归来取用。同年九月，蒙古铁骑踏破成都，遍地狼烟，“凡破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战乱平息后，不知是董氏家族无人返回还是未能寻到窖藏位置，这批金银器竟在地下埋藏了近千年。

菊花金碗（图2） 碗口有三十二曲，弧腹捶揲成菊花瓣形，碗底内心饰花蕊，是彭州窖藏出土的金银器中唯一一件带有年号铭文的器物，足外壁上篆刻着“绍熙改元舜字号”七字。“绍熙”是



图1



图3 瓜形金盏



图2 菊花金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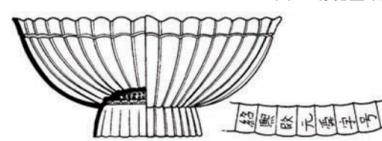


图4 菱形银盏



图5 象纽莲盖溜肩银执壶

南宋第三任帝王宋光宗赵惇使用过的年号，“改元”即绍熙元年（1190），“舜字号”很有可能是制造这批金银器作坊的名字。

插花为宋代雅事之一。宋代男子有簪花的爱好，文人案上亦常见花卉清供。宋代日常用器不仅在造型上模仿花卉，还与花形纹饰巧妙搭配，将雅致的审美风尚融入金银器制作之中，体现出至简至美、至朴至真的独特风格。

瓜形金盏（图3） 两件造型、纹饰相同，整体呈五棱瓜形，每棱用小鱼子纹饰成卷草纹，柄为瓜藤，瓜蒂处饰五片叶子，叶片上有细细的叶脉纹。

“金樽唱晚，月斜窗纸，一梦醉兰池”，宋人雅集离不开酒，梅瓶、注子、温碗、酒盏等酒器造型多样，华丽精美。源于自然的造型灵感，宋人独具匠心地创造出许多模拟植物、花朵、蔬果形态的酒器，花藤缠绕、瓜藤绵延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美好祈愿。

菱形银盏（图4） 这件菱形银盏是仿蜀葵花形状而制的酒器，盏体为六片蜀葵花瓣相互叠压，花瓣线呈S状蜿蜒至盏底。在花瓣之间的带状内，分饰着莲花、葵花、梅花、牡丹花、石榴花、桃花六种缠枝花卉，盏底饰一朵六瓣银团花，花蕊立雕成圆柱状，花瓣为捶揲而成的浅浮雕，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灵动之感。朝开暮落的蜀葵，因最初长在蜀地而名，“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

象纽莲盖溜肩银执壶（图5） 宋代尚古之风和金石学兴盛，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影响了金银器的制作，出现仿商周青铜器造型和纹饰的金银器皿。银执壶盖为仰莲，上立一象，青铜器的纹饰被广泛运用到壶身，有卷草纹、蟬纹、蕉叶纹、卷云纹等，其中蟬纹内饰兽面纹，壶腹饰双龙戏珠纹两组，精雕细琢，美轮美奂。足部饰卷草一周，压铭“罗祖一郎”，宋代执壶也称“注子”，与温碗配套使用，碗内盛热水，将注了酒的执壶放入温碗内，把酒温热后饮用是宋人习惯的饮酒方式。与这件执壶配套的高圈足温碗则仿自商周青铜器“鬲”的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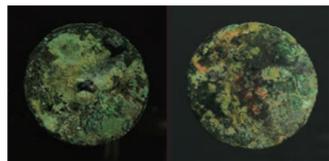
宋代的金银器，从造型和纹饰上皆脱略了唐代的繁缛，呈现出雅致与精巧的审美风尚。

（刘小龙/图）

去齐家文化博物馆观国宝文物

陈君

甘肃省广河县齐家文化博物馆于2007年实行免费开放，2016年10月在齐家文化广场新建成了目前全国唯一以齐家文化命名的专题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1820件。馆内共有发现齐家、走进齐家、精彩齐家、辉煌齐家四个展厅，分别陈列着齐家文化陶器、玉器、铜器、骨器、石器等不同等级的文物480余件。



桥形钮小铜镜



青玉璋



素陶盂

齐家文化是新石器

时代晚期黄河中上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古老文明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共有1100多处，以甘肃境内为主，横跨甘、青、宁、蒙四大省区。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主要分为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石器等等几大类。

青铜镜

铜镜在古代也称为“鉴”或“照子”。远古时期，先民们利用水面映照容貌，而后于陶器中盛水映照，甲骨文中“监”字的写法，就是以器皿盛水而人观照于水。又因受到铜制工具光洁表面成像的启发，发明了铜镜。作为日常用器的铜镜，在我国的使用历史源远流长，根据资料记载，铜镜的源流可追溯至上古神话传说，《黄帝内传》有云：“帝既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镜十二面，随月用之。”20世纪70年代，齐家文化遗址中相继发现三枚铜镜。广河齐家坪遗址出土两枚，一枚是重环形铜镜，另一枚是长方钮小铜镜（中华第一镜），光素无纹；青海贵南尔马台M25号墓葬中出土一枚，上饰有七角星纹。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将我国青铜镜的铸造和使用史提前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和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地区的时间大致相当，在形制上也是以圆形为主，但与以西亚、埃及、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铜镜相比，中国铜镜至少有两点显著特点：其一，西方铜镜都附有直柄可手持，中国铜镜均无柄（直到宋代才偶有出现），镜背设空钮，可穿系佩挂；其二，由于我国古代冶铜技术长期居于领先水平，故铜镜工艺远比西方精湛。齐家文化和商周时期铜镜光素无纹居多，有纹饰也以几何纹饰为主。

齐家文化桥形钮小铜镜，直径6.2厘米，厚0.3厘米，镜面光素无纹，扁平，背面中间附有一桥形钮，钮高0.5厘米，镜面有光泽，圆形较小，出土于齐家遗址M41号墓葬中，通体锈蚀，但边缘规整光滑，属于一次范模浇铸成型。钮部有锻痕痕迹，它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最早的铜镜，在铜镜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镜”。

三足陶盂

盂是中国古代的盛酒器，古人用来调和酒、水。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国就有了泥土烧制的陶盂。盂的形状较多样，一般是圆口，深腹，有盖，早期口部有流，后期流置于腹上，有的附柄（鬲），下有三足或四足。盂的发音同“和”，有调和、融合的意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言：“盂，调味也。”从字形上讲，其上半部分的“禾”指粮食，下半部分的“皿”指容器。盂的意思就是把粮食放在容器里调和一下。陶盂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齐家、大汶口、马家浜、良渚、龙山文化遗址均有出土。商代陶盂一般为敛口，圆肩，管状短流，带盖，有三袋足。陶盂至汉代仍有生产，山东临沂西汉墓

就曾出土带盖兽头形陶盂。原始青瓷盂始于西周，造型仿青铜器，有兽头形流和提梁，有的器腹不通，多为陪葬明器。

齐家文化博物馆这件馆藏齐家文化素陶盂，是国家一级文物。距16.8厘米，口径5厘米，高27.5厘米，足高10.5厘米，夹砂黄陶，胎体较薄，足部有裂痕，保存基本完整。底部有明显的黑色痕迹，是当时用于烧水或者温酒所留下的。器身微束，直腹，有三个中空足与器身相通，这既可以增加容量，又方便生火加热，三足中空设计，又显得稳健有力。在口、足之间有一宽扁的长耳，耳上有泥突似竖向附加堆纹。口沿处有盖，带流口，口、足间饰半圆形把手，好似一个人叉着腰站立。盖与盂身有明显的分界，显然两部分是分别制作的。这件展品曾经在1998年被日本的博物馆借展，凭借其完美的造型和科学的设计收获不少关注。

青玉璋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期至今从未间断，各类玉石被用于制作礼器或装饰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玉璋在中国古代玉器“六瑞”中主要是用作礼南方的礼器，其形状如一把平首圭的顶端斜削去一半，所以《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是有道理的。

依《周礼》所载，璋的种类分为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五种。所制璋本指红色的玉所制成的璋，但目前为止在原生矿中未发现红玉，因而有专家认为，“六器”中所指的颜色不一定是玉的本色，而是指在器物表面涂上朱砂之类的颜色。《周礼·考工记·玉人》有记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天子以巡守，宗礼以前马，大璋亦如是，诸侯以聘女。”可见大璋、中璋、边璋主要是在天子巡行时用来祭祀山川的，祭祀后或埋于山，或投沉于川中。同时大璋也可以作为诸侯婚娶的聘礼。《周礼·春官·典瑞》记载：“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可见牙璋是调动军队的兵符之物，其功能相当于后代的虎符。这件齐家文化青玉璋是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牙璋，1976年临夏州文物普查小组收征于积石山县新庄坪。长边18厘米，短边16厘米，最宽处5.7厘米，刃宽6.1厘米，长条形，两侧微收，双面直刃，属国家二级文物。青绿色玉质，质地细润，通体有灰青色的大理石纹，表面显得十分斑斓。前端是磨制的双面刃，器身两边缘至柄连接处边缘向内收形成小阶梯状，使柄与器身有明显的分界。端尾呈斜角，柄端有一前一后、一大一小两穿孔，孔壁细润，为外撇，柄一侧边缘有凹槽呈“U”形。通体磨光，平洁可鉴。

■馆藏拾粹

影视剧中的同款汽车 到博物馆了解一下

高云飞

在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款1925年生产的老式汽车。如果爱看影视剧的话一定能发现，这款汽车经常出现在谍战剧和抗战电影中，如谍战电影《悬崖之上》中出现了多场这款车飞驰追逐的场景——它就是大名鼎鼎的“T”型汽车。

根据大革命时期中宣部工作人员宋侃夫的回忆，1927年的中共中央机关就有一辆同款“T”型汽车，停放在位于汉口四民街的中共中央机关与怡和洋行公寓之间的巷道内。中共中央机关在汉期间，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时也是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参加联席会议要到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汉口，陈独秀经常两地奔波。根据资料，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经常由秘书黄文容陪同，一起乘坐这辆汽车前往。

2015年，为筹建纪念馆，恢复1927年中共中央早期领导人在汉办公的场景，特委托宁波藏家阮松祥自澳大利亚征集1925年美国产威利斯牌汽车。该汽车由专家按照1927年同时代使用的汽车型号，以及武汉地区相关资料，进行认真考证，选定作为复原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用车替代用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纪念馆进行复原陈列布展时，将汽车陈列于史料记载的位置。

经专家考证，该汽车应为1925年美国威利

（上接5版）

潮汕金漆通雕过潼关图花板（图4） 民国，长53厘米，宽7厘米，高17厘米。楼宇立体、精巧准确，人物众多，布局巧妙，匾额上书“过潼关”，取材于潮剧《潼关遇马超》，演绎了三国关公斩颜良、诛文醜、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等故事，杀得曹操弃袍割须掩面而逃的故事。

人物故事是金漆木雕题材里重要的门类，取材于历史传说、戏剧故事、俗民风情等，大多图谱化、模式化、程式化，折射出百姓向往的理想社会和幸福生活，表达对善恶美丑的颂扬和批判，反映百姓的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取向。常见题材有封神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西厢记、二十四孝、竹林七贤、渔樵耕读等。人物故事题材的广泛应用，客观上起到了知识传播、伦理教化的作用。

此件展品还运用了通雕技法，通雕，也称镂空雕，透雕，结合了镂空、浮雕与圆雕的技法及优势，整体呈现复杂多变、富有动感的视觉效果。通雕层次的多少，视木材的厚薄、工匠技艺的高低而定，少则一层，多则四五层。通雕复杂的工艺特别适合表现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场面宏大、景物丰富的题材。工匠常使用“Z”字形、“S”字形构图，将不同时空地点的人物场景放在同一个画面中，从视觉层面达到多维统一的观赏效果。

潮汕金漆通雕人物图座屏（图5） 民国，长175厘米，宽32厘米，高92厘米。潮汕地区木雕屏风属传统“家具装饰木雕”的一大门类，常见的是由偶数屏扇组成的落地座屏。这件作品别具特色，用于桌上摆放，有九扇屏，由五幅国画、四幅书法以及31块大小木雕、两只木雕狮子及各种纹样的木雕饰件组成；木雕髹漆贴金，杉木框“枝骨”用大漆推光，黑金相映，集国画、书法、木雕、漆艺（推光漆和髹漆贴金）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十分罕见。据屏心国画落款可知画的作者为潮汕地区著名民间艺人沈建初（1891—1961）；书法上又见“巴巴夏月题”等字，可知作品创作于1929年。

潮汕地区的木雕屏风在装饰上采用图案

斯公司生产，其型号为奥弗兰91，软顶敞篷，直排四缸30马力，中央三速排挡变速，电力系统为12伏特。车头左侧红色徽章，为维多利亚威利斯俱乐部徽章，右侧蓝色徽章为维多利亚省巴拉瑞特老车俱乐部成员徽章，并有俱乐部成立40周年纪念字样。车头顶部车标显示车型及产地美国俄亥俄州，车内前排依次看到保存完好的原装方向盘等装置，后排内部为朱红色三座皮椅。2019年11月被评定为三级文物。

大家可能会对威利斯牌汽车感到陌生，但如果提到著名的“Jeep”吉普车，一定会恍然大悟，威利斯汽车就是吉普车的前身。威利斯品牌创始人约翰·威利斯于1912年创办了威利斯·奥弗兰汽车公司。1912到1918年期间，威利斯是仅次于美国福特公司的第二大汽车厂商。但随后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威利斯公司陷入困境，直到二战时期出现转机，威利斯公司与福特及班塔姆三家公司共同赢得了美军战地军用吉普车的生产权。20世纪40年代，威利斯公司制造了著名的威利斯MA和威利斯MB两款军用吉普车，这也是现代民用吉普车的鼻祖。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展出的小汽车，既高度还原了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期间工作用车的样貌，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四处奔波的情景，更见证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那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历史。



正在展出的T型汽车



20世纪30年代报纸刊登的T型汽车



图4



图5

分割，由各种木雕、金漆组合而成，而且人物屏心占据主要位置。这件屏风上方嵌九件横向的金漆木雕，中间为博古，左右花鸟为四幅，周边饰卷草纹，寓崇尚儒雅、富贵白头、喜鹊登枝等吉祥之意。下面是九幅纵向书画，左右边上两幅分别嵌上两件纹样对称的纵向金漆木雕。中间为老艺人沈建初所绘的山水画，左为紫藤、松鹤图，右为葡萄、孔雀玉兰图。值得一提的是书画并非在宣纸上用笔，而是在一块白布上勾勒擦染，这就是“布画”，历经八十七个春秋仍完好无损。九幅书画的外框嵌花草枋栏，

中间与左右第三幅分别是藤蔓、葡萄和葫芦纹，象征子孙万代。书画下有九件横向金漆木雕，中间是“福祿寿星”，左右嵌水草、芦苇及鱼纹，富有生气。

作品的整体细节亦一丝不苟。中间这一扇屏略宽于其他各扇，且从上至下的木雕构图、表现内容和装饰纹样等都与左右不同，通过这细微变化表现主次之分；所有物象均有吉祥寓意，极具传统民间艺术特色；每一幅黑漆底嵌角长方形外框都起立线并描上金线，与贴金木雕相映生辉，富丽堂皇。